

# 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与治理<sup>\*</sup>

杨军昌 王希隆

**【摘要】** 文章对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及其失调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性别比失调的进一步治理提出对策和建议。文章认为,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是作为第一少数民族人口大省和谐社会建构中的一个人口安全隐患,不利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共同繁荣,应予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

**【关键词】** 出生性别比 失调 治理 民族地区 广西

**【作者】** 杨军昌 贵州大学法学院人口研究中心,教授;王希隆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 一、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状与特征

广西位于中国西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山多地少,平原仅占 20.6%;现有耕地面积约 266.7 万公顷,占土地面积的 11%,人均耕地仅 0.05 公顷。广西是中国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全区目前共设 14 个地级市,109 个县(市、区),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人口大省,而且是一个农业大省。2005 年,全区常住人口 4 655 万人,其中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 25 个少数民族总人口为 1 794 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 38.54%。城镇人口 1 565 万,占 33.62%,农村人口 3 090 万,占 66.38%。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从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至今,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已连续 20 多年偏高,且城乡、孩次和各民族全面失衡。

### (一) 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历程及现状

从广西 5 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1953 年“一普”时,广西 0~1 岁人口性别比为 105.57;1964 年“二普”时为 104.89;1982 年“三普”时上升到 110.69;1990 年“四普”时进一步上升到 122.30;2000 年“五普”时达到 125.57,高于全国平均值。从“二普”开始,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便不断攀升,“三普”前即已偏离正常值,随后长期处于高度失衡状态。

从各地级市情况看,“五普”时,广西 14 个地级市中有 13 个出生性别比失衡,除柳州属正常范围外(105.2),其他各市出生性别比都处于 111 以上的失衡状态。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从选抽的 12 个县的住院分娩、引产胎儿、政策外出生、预防接种卡介苗、收养孩子等专项调查资料汇总数据看,2001~2005 年,全区出生性别比仍在 120 左右徘徊(林霁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项目《西南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5XRK0030)研究成果之一。

广西壮族自治区办公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概况》(<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8.17)。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2005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年。

峰,2006)。2005 年广西 1 %人口抽样调查人口出生性别比为 119.8 的数据也证实了全区出生性别比仍处于失衡状态。

(二) 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特征

1. 普遍失衡。根据“五普”资料,广西全区 14 个市中有 13 个市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失衡最严重的地区集中于广西南部,其次是广西东北、西北、东南部的省际交界地区,空间上呈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其中,出生性别比在 130 以上的有 7 个市,包括南宁市、梧州市、防城港市、钦州市、贵港市、玉林市和来宾市,主要分布于广西南部,最高者玉林市为 147.84,其所辖的博北县高达 156.5。出生性别比在 110 ~ 130 之间的市有桂林市、北海市、贺州市、河池市、崇左市和百色市,多处于广西边界地区。2005 年的 1 %人口抽样调查虽较“五普”微有下降,但没有一个市处于正常值域,最低的河池市为 108.42。

2. 城乡差异明显。“五普”时,广西城乡人口出生性别比全面失衡,其中市为 117.12、镇为 127.62、村为 126.5,分别高于全国市、镇、村均值 7.72、4.83 和 2.97。城市人口出生性别比虽低于农村和镇,但已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城乡差异特征反映了农村对男性劳动力和养老的需求更高,男性偏好更强烈,而且因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权重大,故对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升高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3. 随孩次上升而上升。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四普”、“五普”时都表现出随孩次升高而逐渐升高的总体特征。同孩次比较,“四普”一孩性别比为 105.17,“五普”上升至 109.97,首次超出正常值,可见人们已越来越倾向从第一孩就开始干预胎儿性别。“五普”时,二孩、三孩、四孩性别比已分别达到 160.61、184.09、201.67,各孩次性别比都较“四普”有较大上升,二孩及多孩性别比失衡程度日益严重。一至五孩次出生人数占总出生人数的比重分别为 61.62 %、27.43 %、7.7 %、2.26 %、0.99 %,除一孩外,二孩占总人口的比例最大,其出生性别比的高度失衡对总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最大(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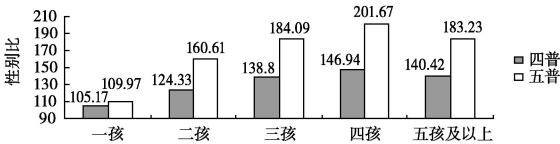


图 广西“四普”、“五普”分孩次性别比

资料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编:《广西壮族自治区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编:《广西壮族自治区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 年。

4. 各民族出生性别比全面失衡,两极偏差明显。“五普”时,广西少数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为 121.01。其中,一孩至五孩及以上性别比分别为 104.05、156.36、197.32、189.01、173.81,除一孩正常外,其余全部失衡,并随孩次增长而增长(四孩后略降)。从各主要民族的基本情况看,全区 12 个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均不在正常值域,其中 9 个不同程度偏高,3 个偏低(仫佬、佯佬和水族),呈“两头失衡”的特征(见表 1)。其中防城港市的京族人口为 9400 多人,占

表 1 广西各主要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及占总人口中的比重

民 族	出生性别比	比重 (%)	民 族	出生性别比	比重 (%)
汉 族	130.64	61.63	瑶 族	112.71	3.35
回 族	125.50	0.07	水 族	100.82	0.04
苗 族	112.84	1.06	仫佬族	100.81	0.39
彝 族	112.00	0.02	毛南族	122.63	0.17
壮 族	123.46	32.40	仫佬族	97.78	0.01
侗 族	117.93	0.69	京 族	143.06	0.05

资料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编:《广西壮族自治区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年。

全国京族人口的82%,出生性别比为广西最高,达143.06;汉族占全区人口总量的61.63%,主要分布于广西东部、南部及东南部,汉族聚居地区正是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地区;壮族人口占全区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84.57%,呈小集中、大分散的居住特征,其出生性别比亦严重失衡,达123.46。

## 二、广西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

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以男性偏好为特征的生育观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2004年,广西计划生育部门对部分地区育龄群众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在不考虑生育政策的限制下,农村育龄夫妇愿意生2个及以上孩子的占77.4%,其中90%以上希望至少生育一个男孩(莫小峰、韦震,2005)。普遍而强烈的男性偏好的产生有着深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根源,但最终都通过具体的行为方式来实现。

### (一) 直接原因

人们的男性偏好虽然长期存在,但出生性别比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偏高的事实说明,生育观念只有转化为行动才能对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选择性生育的各种行为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原因。

1. 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简称“两非”)。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后实施终止妊娠手术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最直接原因。通过一孩出生性别比的城乡比较,可以反映“两非”行为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大影响。由于农村有二孩合法生育权的人口比重较大,人们很少在一孩就进行选择生育,“五普”时,农村一孩性别比为107.3,基本是未经人为干预的自然生育状态;而城镇地区以一孩为主,并具备鉴别工具易得和有支付相关费用能力两个条件,因此城镇对一孩的胎儿鉴定和人工流产相当严重,以致市、城镇同期一孩性别比分别达到113.12和117.86。2000年后,B超鉴定胎儿性别受到禁止,但因高额利润所驱使和人们的需求,屡禁不止。2003~2004年,玉林市在对732家医疗机构的检查中发现违规执业者66家,非法药品器械198件;同期桂林市平乐县发现19起非正常人工流产事件,防城港市发现非法终止妊娠案例9个。从相关部门对全区15个县市区的调研统计中,2003~2004年全区共做人工流产引产24048例(引产7646例),其中有计划生育证明的2060例,仅占26.9%。随着对“两非”打击力度的加大,非法人工流产还不断变换形式,利用地区联合治理的薄弱性,进行跨区域“两非”活动;更有甚者通过注射堕胎剂骗取计划生育证明,达到既逃避惩罚,又能继续“合法”生育的目的。

2. 遗弃女婴现象严重。据广西民政厅统计,2002年,广西社会福利院收养登记弃婴为3976人;2003年为7090人,两年合计的11066名弃婴中,男婴为533人,占5%,女婴10513人,占95%。据广西卫生厅统计,2003年全区住院分娩率为68%,意味着三成多的农村孕产妇仍采用传统的家庭接生方式,使弃婴行为具有较高的隐蔽性。《广西出生婴儿性别比调研报告》显示,2001~2005年从所调研的12个县民政部门福利院收养的孩子中,男性为110人,而女性则为698人(林霖峰,2006)。虽然遗弃女婴对时点出生性别比没有影响,但遗弃女婴的目的在于得到再一次生育机会,而且为把握这一机会而进行人工干预的可能性最大,进而直接影响着时期出生性别比。即是说,极少发生弃婴行为的地区出生性别比一般正常。“五普”时,广西仫佬族人口出生性别比仅为100.81,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6.86。据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相关调

广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赖德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会议上的讲话,2004年6月22日。

查资料,广西仫佬族过去因男孩死亡率较高,历来有珍惜儿童,反对堕胎、弃婴的传统习俗,对该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平衡有重大意义。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弃婴行为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

3. 瞒报漏报。漏报在经常性人口登记上是难以避免的,但瞒报是人们为“多生”和“生男”而有意识的漏报,并以对出生女婴的瞒报为主,这必然造成统计上出生性别比偏高。表2是广西计划生育系统2004年上半年报表与市级抽查的不完全统计对比情况,显示抽查性别比比报表性别比高5个百分点,并且以二孩和多孩的漏报为主。

有学者认为,瞒报漏报对出生性别比偏高只是一种“假象”,被瞒报漏报女婴将随其参与如入学、就业等社会活动而不断暴露出来,通过重新纳入统计使性别比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降低。为此,我们将广西“五普”各年龄

性别比数据反推至“三普”第二年,即0~17岁。如表3所示,其性别比随着年龄的增长虽不断降低,但并不明显,各年龄组性别比都已在113以上,年龄的增长并未使性别比恢复正常。可见,瞒报漏报导致的女婴“减少”在出生性别比攀升的权重较小,影响有限。

## (二) 深层原因

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匮乏,传统生育文化的“刚性”影响和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现实是广西出生性别失调的根本原因。对此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

1. 经济原因。广西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75%左右。2005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2490元,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76.77%。粗放式、体力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客观上需要大量男性劳动力,男性仍是家庭主要创收者,促使家庭对男性产生依赖,因而男性偏好仍“刚性”强烈。在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地区,如集聚于防城港区的京族是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最高的民族(143),这与其生活在沿海,主要从事粗放型的、需要大量男性劳动力的海上捕捞、海水养殖业有关。此外,特殊的经济条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极不完善的状况下,大部分农村难以推行行之有效的社会养老、社区养老等模式,仍旧以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为主,而男性的“养老能力”相对女性来讲明显具有优势,更为实惠,男儿是农村老人晚年生活的保障与寄托。因此,“养儿防老”是人们的现实需要和理想选择。但是,经济发达和社会养老体系相对完善的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衡问题,这与农村的宗族观念和社会对女性的不平等规定有关。

2. 宗族观念。宗族观念主要通过多子多福的生育观、无所不包的关系网、宗族制度下的“子民”或“臣民”意识等形式来影响人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在传统宗族观念下,人们将自己作为由祖宗传下来的生命链中的一个环节,将这一链环延续下去是他们一生不可推卸的责任。广西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宗族观念都相当强烈。如壮族在社会结构上,多代同堂的扩展家庭比例较大,父系单轨制宗族结构和宗族关系十分紧密,认为“族丁兴盛家族盛”、“亲戚亲三代,宗族亲万代”。

表2 广西2004年上半年出生性别比半年年报与抽查对比

	出生性别比	一孩性别比	二孩性别比	多孩性别比
报表性别比	116	104	141	191
抽查性别比	121	105	151	253
报表与抽查对比	- 5	- 1	- 10	- 62

注:表中数据为广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

表3 广西“五普”0~17岁人口性别比情况

年龄(岁)	性别比	年龄(岁)	性别比
0	124.81	9	125.27
1	127.34	10	122.81
2	129.87	11	118.28
3	128.26	12	116.01
4	128.01	13	115.04
5	126.55	14	114.33
6	125.65	15	112.94
7	124.55	16	113.92
8	123.33	17	116.10

资料来源:同表1。

壮族的“青蛙崇拜”(青蛙象征多育)、“花婆信仰”(花婆专司生育),反映了崇尚人丁兴旺和“传宗接代”的男性偏好特征。其他民族,如瑶、侗等族的“敬桥求子”习俗、布依等族的“送瓜”习俗,都体现了在宗族观念下的人们生生不息的子嗣祈求。宗族观念在具有男性偏好特征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对女性的歧视。广西农村普遍存在着父亲父权决定女性的家庭地位,女儿不继承家产,不承担养老义务,血脉传承者只能是儿子,无子则意味着家嗣延续中断。这种传统宗族观念中的重男轻女色彩既是生育观念的来源之一,又对生育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3. 社会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客观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环境与以“重男轻女”为中心的宗族观念的共同作用,使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待遇严重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对人们的生育决策产生了负面引导作用。在子女教育上,由于家庭资源有限,在教育投资上一般都是“先男后女”,从而使女性文化水平普遍低于男性。“五普”时,广西女性文盲率为8.85%,比男性高4倍多,每10万人拥有的女大学生为833人,仅为男性的1/2。文化水平决定了女性就业竞争的弱势地位,“五普”数据显示,广西失业的66631人中,女性占73%。在职业分工上也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女性仅占19.2%,只有商业、服务业的女性比例才超过男性。所有这些导致妇女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上,尤其在领导权、决策权的参与度、参与层次、参与比例、参与渠道上受到限制。在其他方面,如在土地权益上,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在土地法中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土地权益,但受一些地方不合理的乡规民约、宗族观念的影响,许多妇女出嫁、离婚或者丧偶再嫁之后,既失去了原有土地,又得不到新土地,成了失地妇女或无地妇女。在现实社会中女性遭遇的种种不平等,使父母在生育选择上多倾向于通过生男来实现“风险”的最小化。

### 三、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的治理与对策建议

#### (一) 治理措施

2000年7月底,广西颁布了国内较早的一部地方性专治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禁止违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2005年自治区宣传、人口和计划生育等11部委共同发布了《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十一个部委关于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的意见的通知》;2006年发出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人口和计生委等部门关于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调的政策法规体系逐渐形成。广西各地以各种传播媒介为载体,以“关爱女孩行动”为契机,开展宣教活动,为转变工作方式,提高群众参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广西各地建立了系列利益导向机制。如玉林市实行对农村独生子女户、两女户家庭免费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分别提高住院报销比例的20%、30%;实行中考加分制度,独生子女加10分、两女户加7分;给予独生子女户每年每人保健费120元。各级政府通过组织协调,建立组织联合执法队伍,定期对个人诊所、医疗卫生机构、药品生产销售企业进行检查整顿,严惩非法鉴别胎儿性别和人工流产、非法出售终止妊娠药物、遗弃女婴等行为。同时为了防治毗邻地区尤其是省际交界地在管理上的漏洞,进行省际或县际协作,互通信息,共同治理。

通过上述治理,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得到初步改善。出生性别比由“五普”的125降至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时的119.8。在孩次上,2001~2006年,一孩性别比都回到正常值,有效控制了一孩的人工干预,二孩及多孩性别比都比“五普”有明显降低。2006年上半年,自治区计划生育数据显示,广西14个市除柳州上升为114外,出生性别比都较“五普”有

明显降低,其中桂林、北海、来宾、贺州、梧州、钦州、贵港、玉林 8 市都降到 113 以下。

尽管广西出生性别比总体上有明显降低,但仍处于偏高状态,而且下降趋势并不稳定;一孩性别比虽归于正常,但是二孩、多孩仍高度失衡,个别年份还有所增长(2005 年的二孩);此外,个别市还呈不降反升趋势,如柳州市由“五普”时的 105.2 上升到 2005 年 1% 抽样时的 119.50。在治理工作上,也存在诸多亟待改进的问题。如在治理法规上,个别地区未形成适应地情的地方性法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还存在;同时,由于普法工作滞后,群众法制观念淡薄,还存在为他人隐瞒包庇现象;此外,处罚方式还以经济处罚为主,法制威力面临挑战。

## (二) 进一步治理的对策建议

人口出生性别比由失衡到正常,再到无需政策干预的自然平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必须进行长远规划。首先,治理工作初期,出生性别比的失衡态势要求治理应尽早、尽快、尽力,而且应依靠强制性行政组织和法律法规保障。其次,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应及时调整工作方式,变“堵”为“疏”,变“惩”为“奖”,推动出生性别比继续下降,最终实现平衡。最后,从导致失衡的综合机制上看,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改变女性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在政策干预初期,人口出生性别比一般下降较为明显,但进入特定阶段后,人口出生性别比就很难继续下降,并呈相持和波动特征,出生性别比失衡体现出“刚性”特征。这种“刚性”表现为某些固定环节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探寻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的原因,适时调整并启动新一轮的治理方案尤为重要。因而需要健全相关治理法规,制定出适合本区区情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在具体工作实施上,应当依法管理,建立健全孕情监测、报告和随访制度,B 超、药品管理制度,经常性宣传教育制度,区域合作制度,举报奖励制度,责任追究和“一票否决”制度等。

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治理有赖于经济的发展。首先,发展经济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解除人们的养老“后顾之忧”,淡化家庭对男性的依赖。其次,加快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直接减少出生性别比较高的农村农业人口比重,有利于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整体下降。再次,加快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发展,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和生育观念的重构,有利于摆脱农村宗族制度和“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最后,加快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政府奖励扶助和解决女孩入学就业的养老能力,消除女孩“成长风险”,使父母在生育决策上放弃男性偏好。

总之,广西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第一少数民族人口大省和谐社会建构中的一个安全隐患,不利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客观现实要求决策者与实际工作者要充分认识人口出生性别比治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全面地把握地情的基础上科学决策,综合治理,才有可能提高治理效果。

##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人口与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编(2002):《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上、中、下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2.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编(2007):《2005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3.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编(2002):《广西壮族自治区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上、中、下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4. 林霖峰(2006):《广西出生婴儿性别比调研报告》,载于《实践与思考》,中国人口出版社。
5. 莫小峰、韦震(2005):《略论广西人口性别比》,《广西社会科学》,第 7 期。

(责任编辑:朱萍)

der the situation that enterprises' burdens of social security are overweight ,to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level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must be strengthened. The government ought to play more active roles in the respects of financial support ,fundraising , and legislation.

#### Accessibility to Healthcare Resources and Farmers' Health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Miao Yanqing ·47 ·

Based on a household survey in 46 villages of Jiangsu ,Shandong ,He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the paper describes health status and demands on healthcare in rural areas ,analyzes the effect of healthcare resources accessibility on health status using the Logit model. It concludes that access to healthcare resourc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health level. The strengthening of rural preventive care and improvement of village-level medical expertise are particularly beneficial. Income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health status for lower income households.

#### The impact of Childhood SES on the Mortality Risk of China's Oldest Old

Shen Ke ·56 ·

Based on the four-wave datasets from Chinese Longitudinal Survey on Healthy Longevity ,conducted in 1998 ,2000 ,2002 and 2005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childhood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on the mortality risk of the oldest old. By conduc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childhood SES is partly mediated by adulthood SES , but not by health behavior. In addition ,after controlling for adulthood SES and health behavior ,father's occupation still has a significant independent influence on the mortality risk.

####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Graduates' Employability Skills

Song Guoxue ·64 ·

Based on customized generic model method ,this paper formulates the measurement index of employability skills as the base for investigating university graduates. The study employs factor analysis to construct the dimensions of employability skills and to confirm the validity of measurement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of graduates ,through which the signs of main dimensions could be analyzed. Besides that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ANOVA) and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are conducted to tes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fferences among gradua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employability skills among those graduates.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specific items ,discrepancies of other skills are not visible except specialized skills. This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employability skill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graduates.

#### 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1949-2000

Li Yu ·73 ·

Using 2000 census data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trends and pattern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in China from 1949 to 2000. Results show tha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pouse's educational levels was stable or slightly decreased in early years ,but increased dramatically in the 1980s. Those changes in educational homogeneity were due to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s of the uniform association and the diagonal effec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author presents an unconventional argument that the strengthened educational homogamy was a result of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and emerging market risk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is indicates the boundary between social groups might become stronger in the last decades of 20th century.

#### Causes ,Effec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Sex Ratio Unbalance at Birth in Guangxi Zhuangzu Autonomous Region

Yang Junchang Wang Xilong ·80 ·

This paper describe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x ratio unbalance at birth in Guangxi ,analyses the main factors and influences of the unbalance ,and addresses countermeasures to i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serious unbalance of sex ratio at birth in Guangxi is a latent danger of population security ,for this may highly negatively affect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ty regions and the mutu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nationalities ,even endanger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of nationality regions and the frontier security of the country.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take positive and active countermeasures on the matter in order to normalize the sex ratio at birth.

#### Rethinking about T. R. Malthus

Wang Cuntong ·86 ·

The book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uthored by T. R. Malthus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nd debatable masterpieces in th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mathematical demography methods to argue that the geometrical ratio and arithmetical ratio are correct and reasonable ,and discussed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interpretation to his theories. The article calls for giving this book comprehensive reconsideration.